

第一章 巴金与陈行的身世对比

第一节 家庭身世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如果我们把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称为“先贤祠”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这里是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孕育之地。由此看来，一代文豪巴金生长的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巴金，原名李尧棠，汉族，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当代文坛宗师。有关他的笔名的由来，据说是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

“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一个“巴”字。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而关于陈行这个笔名的由来，笔者以为，从字面上看，“行”有“伶仃”之意，或可理解为内含“孤独”之感，含蓄地寓意自己的身世或志趣。

巴金先生诞生的年代，正是风雨如磐、国难当头之时，在列强的欺凌下，大清帝国摇摇欲坠；而西风东渐，又使传统的封建文化面临瓦解。巴金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成都度过的，这里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一个典型的休闲城市，所谓的温柔富贵之乡。大大小小的官宦人家、富商巨贾在这里营建他们的安乐窝，公馆之多，形成了一道怪异的风景线。每个公馆都有类似的格局：牌坊式的门楼，灰色的高墙，威严的石狮子；墙内则是典型的传统园林，楼台亭榭，朱栏玉砌，奇花异草，曲径通幽。这种公馆又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门庭森严，面目狰狞；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巴金就出生在这样的公馆里，他在回忆

录中写道：“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有四五十个仆人。”仆人和主子的比例高达一比一，可见其家族当时的显赫。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大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是整个社会关系的缩影。这样的家族，不仅使子弟从小就浸淫在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里，而且也为子弟们提供了较早认识社会的机遇。巴金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获得了大家族的文化和教育优势。李氏家族虽然无法与那些享誉全国的贵胄世家相比，也没有《红楼梦》中贾府那样的权势和豪华，但到巴金这一代时，这个家族也已经兴旺了五代，颇具规模，算得上成都地方的名门大族了。巴金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叔父，都当过知县以上的官吏；这个家族“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公馆本身构成了一个社会，像一切大家族一样，严格遵守着三纲五常的礼法，同时嫡庶之间，各房各支为了财产暗中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它的主人阶级奢侈腐化，而奴才们却受尽凌辱。正是大家族的生活，使巴金从幼年起，就接触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及家族制的真相，使他得到了其他孩子们所不能得到的社会知见，促进了其早熟，并以深刻的印象刻印在了巴金的记忆中，成了以后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库藏，具有了无比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李家也是世代书香门第。巴金的祖籍浙江嘉兴，本是文人荟萃之地，巴金的高祖被保荐入川为官，把重视家族文化教育的传统也带到了成都，并传承不绝。在这个家庭里，到处弥漫着一种文化的气息。巴金4岁起，母亲就把《白香词谱》当成对儿子的启蒙课本。稍长，又有家族所聘的塾师与家长对其进行了较严格的古典文化的讲授。大家族累积的巨大文化和社会优势，使巴金无意识地向作家之路迈出了第一步，并奠定了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基础。这些家庭教养使巴金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激发了其对文学的兴趣。巴金从小就是一个感情丰富而敏感的儿童，对于这样一个儿童，古典诗词、散文的大量学习，长辈们吟风弄月的风习，全家都爱读古典小说和看戏的氛围等等，无形中都在开启和培育着巴金的文学情思，也为其日后做一个文学家贮备了必要的知识和能力。

在李家公馆，那时是他的祖父当家，祖父保守顽固，对子孙坚持守旧的教育方法，什么都是他自己说了算。巴金的父亲李道河，谨守封建规范，安分守己，温和宽厚，并且很爱巴金，经常带巴金出入剧院看戏。巴金二叔曾留学日本，在成都开办律师事务所，但是他道貌岸然，在老太爷去世之后，巴金大嫂生产之际，以“血光之灾”为名强迫巴金大嫂迁出城外，致使巴金大嫂难产而死。巴金的三叔、四叔、五叔均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巴金的大哥大巴金六岁，从小聪慧、能文能武，深得父母宠爱。中学时“品学皆优”，喜欢化学，幻想去德国深造，可是在母亲去世不久，便被祖父和父亲用拮据的方法决定了他的婚事，又找到了商业场的工作。一年后，父亲去世，作为长房长孙的他彻底充当了牺牲品。巴金的三哥与巴金关系甚好，童年时一道读书、游戏，后来又一起去上海、南京读书。当然，巴金的童年经历中还有母亲的爱，巴金说母亲是他“第一个先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正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抵。”¹在爱的环境中，巴金也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在自己富裕的家庭中，另一些人在过着不幸的生活，“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了。”他回忆道，“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叛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²

与巴金这位从封建官僚家庭走出来的热血青年不同的是，陈竹出身于一个华侨平民家庭。他原名林青，1932年出生于泰国曼谷，祖籍中国广东省揭阳县月城乡，曼谷华人聚居的唐人街是他和家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是由“三路一街”组成，即耀华力路、石龙军路(西段)、苟越路和三聘街及其附近一些街区组成，其面积很大，约占整个曼谷市区的五分之一。其中三聘街是一条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正宗唐人街。曼谷王朝的开国君主帕普塔育华珠拉洛，1782年登基时

¹ 巴金.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31页

² 巴金.巴金自传·家庭的环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59页

称为拉玛一世王，将首都从湄南河西边的吞武里迁到河东面的曼谷，而在择址修建皇宫的地方(今皇家田广场一带)，已经有华侨居住，于是便御赐迁居，并指定湄南河以东一块新的地段供华侨开发营生。这一地段大部分尚未开发，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到处是沼泽和泥塘。后经华侨多年开拓垦殖，排水筑路并大兴土木，逐渐变成一个生气蓬勃的居民点。到拉玛三世(1824—1851)时期，来此居住的华侨日益增多，并聚居三聘街一带。关于三聘街名称的来历，说法有二：其一为当初在居民点设摊做小生意的只有三位华侨，三聘是泰语的译音，即三个货摊之意。其二这是高棉人语，其意为娼妓。即在中国人迁入之前，该地为高棉人居留地，后来高棉人迁走一空，终于由高棉人妓女区而发展成为曼谷唐人街。³自此以后，三聘街一直是一条由华侨经营的商业街道，全长约一公里。

作为泰国华人社会缩影的三聘街，华人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三聘街也是华人某种生活形态的标准，每当人们谈到职工月薪的时候，人们惯常以三聘街的某店某职员为例，甚至在谈婚论嫁时，往往也以三聘街姑娘作为理想的原型。

同处一个时代，不同的家庭环境，封建礼教的虚伪冷酷，封建家庭的复杂境况，使得巴金和陈竹都在倾心观察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并寻求解决之道，自然，他们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切的感受。

第二节 求学与思想成长历程

1914年巴金母亲病逝，1917年父亲病故，家庭内部争斗愈加激烈，他萌发了冲出这座囚笼的心思。他说：“父亲死后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友爱的表面下，我看到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⁴15岁的时候，巴金进了成都一所公立学校——外专，终于第一次冲出了大家庭的罗网。以上是巴金童年的生活经历，在这样的生活经历中，童年给巴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迹，他过早地感受了悲欢离合。童年也使巴金养成了进取、爱憎分明、勤于思考、敢于批判社会的性格品质。这一切便构成了巴金的童年经验的内涵。

³ 李少儒. 锦绣泰国. 曼谷: 华文电脑出版社, 1974. 第2页

⁴ 巴金. 巴金选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第94页

巴金脱离家的“牢笼”，进入成都外专以后，进一步接触了五四新思想，成长为一个进步的爱国知识青年，并参加《半月》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初步显露出写作才华。之后又相继到上海南洋中学、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苏州东吴大学等地念书。1927年赴法留学，在法国期间创作了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开始构思《灭亡》系列小说，其中就包括《春梦》。它实际上与《家》的内容基本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几乎没有动笔。后来巴金回忆“我回国之后，始终没有把《春梦》《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断，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失去了信心。”⁵巴金陷入了无助的状态之中，只好靠译书来打发日子。1929年7月巴金大哥来到上海，巴金又见到了久违的大哥，和他度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这些使他成为《家》构思过程中一个重要契机。巴金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认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到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⁶巴金大哥回家以后，他曾给巴金写信讨论过《春梦》的创作。他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公，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⁷巴金受到了鼓舞，“我读了信，受到了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把我的感情，我要把我的过去咽在肚子里的话全说出来，我忍不住多次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⁸他开始动笔创作，但很慢。就在这个时候，巴金大哥自杀了。“我愤怒，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我一

[5] 巴金.巴金自传·谈《新生》及其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125页

[6] 巴金.巴金自传·谈《新生》及其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125页

[7] 巴金.巴金自传·谈《新生》及其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125页

[8] 巴金.巴金自传·谈《新生》及其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125页

夜都不曾闭眼，经过了一夜的思索，我最后一次决定了《家》的全部结构。”⁹这便是巴金小说《家》的全部构思过程。童年经验对巴金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巴金从小便埋下了对封建家庭的仇恨和对亲人的不同情感。但是单纯的童年经验并不能直接推动作者情感的升华，进入创作。甚至《春梦》的最早构思也与作者的童年生活关系不大。

倘若只是在大家族“上等人”中间生活，即使他可以对其生活十分熟悉，但最多只能成为贾宝玉式或者如《歧路灯》的主人公式的人物，难以成为伟大作家。正如曹雪芹的生活道路发生了转折，使其成为伟大作家一样，巴金也经历了大家族的没落以至崩溃，而且在大家族的生活中也另有自己的角落。灾难和死亡，使一个无忧无虑的儿童变得多思而早熟。接二连三的亲人的离去，极大地触动并影响着年少的巴金。在论述巴金成长道路的许多著作中，对于这一连串的“死”的影响，往往未予足够重视，有的传记中只是轻轻带过。实际上，一个人在少年时所受的刺激，往往对其一生的心理、性格和人生道路都造成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改变其人生理想和追求的契机。这可从鲁迅祖父的科场案与鲁迅父亲的病对鲁迅的影响之先例可看出，同样，巴金在回忆中说道：母亲死后，“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¹⁰又说：父亲的死，使“我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¹¹成了孤儿的巴金，明白自己的处境。他说：“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大家庭的面目。”他发现，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和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¹²巴金说：“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上投下了阴影。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恐怖和悲痛的意义了。”其结果是他“渐渐地

[⁹] 巴金.巴金自传·关于《激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第 142 页

[¹⁰] 巴金.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59, 第 62 页

[¹¹] 巴金.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59, 第 99 页

[¹²] 巴金.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59, 第 136 页

变成了一个爱思想的孩子”。¹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此形成了他忧郁的气质，孕育了他的叛逆性格，而且“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青年和中年的巴金。其二，与“下人”的接触，更加深了他的思考。作为“少爷”的巴金，与同是“少爷”“小姐”的兄弟姐妹虽同处一个公馆，却有自己的另一方天地——“下人”社会。这可能由于巴金的母亲富有仁爱思想，也可能因为处于末世的大家族疏于防范，使少年巴金突破了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得以接触了“下人”并从思想上与之交流。在父亲的广元县衙时，幼年巴金即目睹了贫苦百姓如何受到冤枉与酷刑；在家庭生活中，又和保姆杨嫂、仆人香儿朝夕相处。在成都生活的十多年中，他又常到门房、厨房、马房里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玩，帮他们烧火，看他们打牌、抽大烟，听他们讲述自己不幸的身世和各种故事。他看到了，公馆里四五十个“下人”构成了与“上等人”相对照的另一个世界——贫穷、阴惨、绝望的世界。老仆人袁成在外面的烟馆里被警察捉去两次，放出后不久就病死在门房里，巴金亲眼看见他骨瘦如柴的尸身被放在大门外石板上，盖着一领破席子。仆人周贵因偷巴金祖父的书画被判刑、赶出去做了乞丐，后来冻饿死在街头。另一个老轿夫在巴金家对门的一个公馆当看门人，被诬陷偷了东西而吊死在大门上（巴金《我的幼年》）。在这个世界里，巴金看到、听到了另一个阶级的生活和语言。由于他的真诚和同情，使他得到了“下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一直继续到他离开成都为止。“下人”的生活可以说在少年巴金心灵上投下了第二个阴影，促使他不知不觉间朝着封建叛逆者和未来文学家的道路迈出了最初脚步。因为据现代心理学与美学的研究，人的婴幼儿期，特别是少年期（8—14岁），个体的生命活动与艺术活动，往往奠定了以后全部生命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基调或基本样式。托尔斯泰甚至认为，七岁前后的儿童已经朝着审美成熟的目标，迈出了决定的一步。¹⁴

少年时代的家庭经历对巴金造成了以下几点影响：

[¹³] 巴金.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59，第136页

[¹⁴] 张涵.艺术与生命.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25页

(一)奠定了巴金叛逆性格的基础。少年巴金与“下人”感情的共鸣，使其对压迫这些“下人”朋友的社会“起了火一般的反抗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15]他想做一个铲除社会不平的“剑客”，虽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毕竟是一种反抗封建专制的强烈要求。“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笼。”^[16]正是这种在当时还处于潜在状态的意识，成了他在“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潮的基础，成了他叛逆旧秩序的前奏。他与大哥、三哥等兄弟姐妹生活在同一环境中，唯独他走上了叛逆之路，原因正在于此。

(二)形成了其人生原则的雏形。巴金常把轿夫老周称为自己人生中的第二个老师。这个经历坎坷的轿夫，不仅使少年巴金了解了下层人的许多故事，而且告诫巴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这些近乎原始的简单的正义的信仰，深深地铭刻进了巴金的心灵，使他终生不忘。他说：“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巴金《将军·序》）。这与母亲教给他的“爱一切的人”的思想一起，成了他人生态度的根柢。在创作上也使他终生遵循“说真话”写真实的原则。

(三)规定了创作的未来自方向。两个“阴影”，使他看到了公馆内的专制、压迫，也略略知道了公馆外社会的一些情形。这不仅给以后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形成了他的一种敏感，一种倾向——青年们在封建礼教下的悲剧，劳动者的生活，成为他特别关注的中心。如他在厦门偶然见到的疯女，引起他写下了反封建的《春天里的秋天》；一个轿夫，一个木匠的故事，都使他立刻感受到广大下层人的命运，所以，才有了他以后的长兴煤矿之行，有了他关于锡矿工人的创作。连小说《砂丁》中工人们那种原始的、纯朴的正义的行为，都打着轿夫老周的烙印。

[15] 巴金：《巴金选集》第10卷，.《我的幼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94页

[16] 巴金：《巴金选集》第10卷，.《我的幼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94页

巴金之所以走上文学之路并成为一位伟大作家，他的政治热情与在政治道路上的所遭遇到的挫折，也有重要作用。一个闭目塞听、远离时代政治运动漩涡的人，不可能成为杰出作家。因为他不可能把握住时代的重大主题，不可能有创造宏篇巨制的眼界和气魄。然而一个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巴金终身服膺的赫尔岑、巴尔扎克、左拉等著名作家，都曾以不同方式积极参加某种政治斗争，都曾遭到重大挫折，有的还被监禁、流放或被迫流亡。政治斗争使他们鼓起了巨大热情，观察研究社会问题，而逆境使他们诉诸文学手段，作为抒发被压抑的政治理想与继续向敌人攻击的武器。他们深厚的文化与文学修养足以保证了其成功。别林斯基说“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对于艺术家来说似乎更为准确。

青年时期的巴金并没有想当文学家，而是曾立志做一个社会革命家。他在1920年接触了《告少年》、《夜未央》之后，就立刻狂热地迷恋上了安那其主义，自以为从俄国民粹派、民意党人和安那其主义者身上找到了“终身事业”（《信仰与活动》），“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巴金选集·后记》）。1927年他给友人的信中申明要“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海行杂记·两封信》）。为此，他虽然在十六七岁时已表现出了文学的才能，发表了一些诗歌与散文，但在以后几年中却抛开文学，积极地参加了安那其主义的宣传活动。假若中国革命形势没有发展那么迅速，“安那其主义”运动能在中国开展一个时期，也许会圆了巴金的“英雄梦”。然而几年后，对他政治信仰的打击接踵而至：1927年4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巴金曾为这场革命而欢呼，但转瞬间风云突变，革命被杀死了。中国老牌的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参加了国民党，做了中央监察委员，作了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急先锋，从此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分崩离析。这对巴金来说无疑似晴空霹雳。1927年8月，国际上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和萨柯，被美国政府诬以抢劫杀人罪，关押六年之后终于判处死刑。这之前巴金与世界上许多正义人士一起参加了声援、营救活动，但美国政府不顾世界的抗议，撕下了“民主”的面具，对二人执行了死刑。巴金的朋友、中

国留学生吴克刚和波兰革命者亚利安娜这对恋人，与二十多个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在这之前，日本政府残酷杀害了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大杉荣夫妇与外甥桔宗一。这些事件沉重打击了巴金的革命家梦想。他感到全世界几乎都沉沦在疯狂的深渊，到处都是压迫、杀戮、流血，然而自己所信仰的安那其主义对此毫无能为，并且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队伍本身又在分化……。信仰与现实发生了尖锐冲突，巴金陷入了深刻的思想矛盾。回国后的二三年中，巴金仍与一些同志奔走呼号，但根本无法再造成声势，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显得那样微弱。“安那其主义”的理想是美妙的，他舍不得放弃；面对黑暗的无力，他又找不到出路。激昂的政治热情无法在现实的革命活动中表现出来，因而转向以文学之笔来宣泄。1928年，在他中断了文学写作五年之后，却写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正是这种政治挫折和内心矛盾的产物。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销声匿迹，对新的政治运动和组织他又游离在外，文学终于成了他唯一的终身的职业与斗争武器。

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是巴金一生不渝的信念。五四运动给了他最初的洗礼。剧烈的时代变革和新文化、新思想，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年轻的巴金目睹了他出身的那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黑暗和没落，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在成都他就走出了家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一些社会斗争。自1923年起，和当时的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巴金怀着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的憧憬，开始了他的寻觅和漂泊的生涯。那是一个思想及其活跃的年代，一代年轻人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上下求索。整整四年时间，巴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纳着各种新的思想，其中，无政府主义给他以极大的影响。早在成都时，巴金就接触到了这一思潮。无政府主义对强权和专制的否定，强调“人的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良心是正义的基础，个人的自由和集体的自由是人类秩序的唯一创建者”，以及为人类社会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图景，这对出生于黑暗的封建大家族，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光明的巴金无疑是轰天巨雷。无政府主义一时间成为他反抗封建专制，试图改造社会的武器。这一时期，巴金自称“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安那其主义者”。同时在漂泊生涯中，他也深深感受到民族灾难的深重。他立下了这样的志

向“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于是他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法兰西，是青年巴金向往的“革命策源地”。1927年初，巴金开始了他的西行之旅。在这期间，巴金大量阅读了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给他以极大的影响，他由衷地钦佩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先驱者。

每个人各异的理想与信念，支撑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四十年代受马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十年代初，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侨男女青年，不顾家人的阻拦，怀着满腔的爱国之心和报国壮志，毅然奔赴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陈竹也不例外。前一节本文曾论述过巴金和陈竹生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由此带来的是两者的教育经历也会有所不同，巴金曾经负笈法国，而陈竹却是靠着自学，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1956年，他凭着优秀的文才首先进入到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负责采访和撰稿工作，由于在回国前已在泰国加入了共产党，响应中共的号召也是其回国的初衷之一。一年多后被调任至北京总社，在专稿部担任记者，直至1969年被派往干校学习。由于陈竹先生英年早逝（1970年因肺癌病逝于北京），且其身边的原同事、亲友大多已作古或无从联络，尽管通过笔者竭力采访少数知情者和搜集相关材料，但所获田野资料仍较有限。

第三节 生活阅历与创作生涯

作家的为人和为文风格，无不受着生活阅历的影响。在爱国主义情感倾向及由此在其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浓厚报国思想上，巴金和陈竹两位先生是一致的。

巴金在《家》的第一章，描写了觉慧与觉民从外国语专门学校放学回家的途中，兴奋地谈论着学校用英语演出《宝岛》（今译《金银岛》）的事情，以此作为这部巨著的序幕，显示了世界新潮是如何在中国某些城市青年中激荡。这里的开放风气，激荡的时代风云，也使巴金较早地接触到了世界新思潮，包括影响了他一生的安那其主义。巴金虽然不善言谈，但他的热情、真诚使他能够“广交

友”；他的“不安分”的性格，又使他不断地在各地朋友间穿梭，行“万里路”。因此，这不仅在朋友的友谊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思想和人格，而且使他开阔了视野，广泛了解国内外各阶层生活，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说：“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给了我……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巴金的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生活经历并不太丰富的缺陷。

1923年，他19岁即离开成都，顺江东下，行程数千里来到上海。之后，到1927年初出国之前，他活动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1927年远渡重洋，经历数国，来到法国。先后到过巴黎、马赛和沙多·吉里。1928年末回国后到抗日战争前，巴金经常往返于泉州、广州、青岛、京津、沪杭之间。曾三次去泉州探访朋友，也到过浙江长兴煤矿观察体验。在1934年末和1935年初，到过日本东京、横滨等地。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展转于上海、两广、云贵等地，也曾应黎烈文之邀，到台湾旅行。

50年代到1966年“文革”前，巴金依然精力旺盛地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朝鲜“战地访问团”等各种团体，到过波兰、前苏联、德国、日本等七个国家。在国内到过晋、苏、琼等十多个省份。几乎所有大文学家、学问家，都是足迹遍天下的。一个闭目塞听、足不出户的人是很难成为文学家的。在巴金的作品除了《激流三部曲》、《憩园》等大家族生活的小说之外，其他大部分作品几乎都与他的旅行、奔波生活有关。《爱情三部曲》、《新生》、《春天里的秋天》素材来源于福建的行程和朋友的事迹；著名的小说《月夜》，散文《小鸟的天堂》等，其素材得之于广东的旅程；《萌芽》得之于长兴煤矿之行；《砂丁》的素材得之于朋友的讲述；《神、鬼、人》来之于日本之行；《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寒夜》以及关于小人小事的短篇小说，都是抗日烽火中

四处奔波中的经历和见闻。其大部分散文如《海行杂记》、《旅途随笔》、《旅途杂记》、《龙虎狗》等自然都是海内外跋涉中的记录。

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读者。巴金是一个有非常丰富阅读经验的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曹雪芹、鲁迅等思想家和作家，一直为巴金所热爱和推崇。尽管他们在年代、国别以及思想艺术上都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诚和作为人类良知的存在。巴金在他们的作品和人格中吸取了大量思想，并且用他们的精神和品格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他说过，“我的灵魂就是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把心交给读者”，就是这种真诚和良知在巴金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中的生动体现。文艺是情感的传达和心灵的诉求，它要求和读者沟通。而巴金的创作正是在这一点上卓尔不群，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有鲜明的情感态度，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激情澎湃，如江河奔流。即使叙事冷静的作品，也蕴涵着像火山熔岩一样的热力。这就大大缩短了和读者的距离，而也成为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巴金非常欣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谈赫尔岑著作的一段话：“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其实这也是巴金创作的真实写照，他燃烧自己，也照亮了别人。而且，巴金的作品还有强烈的时代感，从《灭亡》到《随想录》，他总是与时代同行；他的作品也总是能拨动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神经。

巴金对自己的写作一向持低调的态度，但一谈到《家》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过的一切。

文学是情感的传达。巴金动手写《家》的时候是在1931年春，还未到而立之年，不要说年少不识愁滋味，年轻的巴金心里已郁积了太多太多的愤恨和悲哀。封建官僚家庭的黑暗，漂泊世界所感到的社会的罪恶，以及五四以来各种新思潮在他胸中的激荡，这一切都触动了巴金那颗敏感的心，是生活逼迫巴金不得已拿

起笔来抗争。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巴金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的笔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人”形象被表现得令人触目惊心。

《家》是一部极具思想力度的作品。巴金不仅仅是对高公馆这个黑暗王国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更是把矛头对准了那个吃人的罪恶社会和制度。他是在向整个封建社会开战。《家》不仅描写了封建专制对人的肉体的摧残，而且揭示了这一专制对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毒害。

可以说，《家》拨动了那个时代青年一代最敏感的神经，说出了蕴藉于他们心中的愤懑、哀怨和追求。无数的青年在《家》中吸取了精神营养和力量，奋起抗争，冲决罗网，走上新的生活，乃至走上革命道路。巴金实际上成为当时青年一代的代言人和精神偶像。陈行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

陈行在《三聘姑娘》中三次提到了巴金的《家》，甚至还提到了觉慧和琴的名字。《三》（即《三聘姑娘》，以下均简称为《三》）中塑造了宝珠的老同学、年轻的司账员张明翰，笔者以为，张明翰这一形象是作者在创作时的一种理想的投射，即以自身作为创作原型的。因陈行在泰国生活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账员，即会计员。当时的记账员收入分两种，一种是年底分红，约一至二保升（当时的计数单位），另一种无分红，而当时的泰国政府并不承认中国记账员的合法地位，因而，在当时，记账员卑微的职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使其处境十分尴尬。加之当时的泰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劳工策略上施行“保留职业”政策，包括理发、裁缝等七十二种职业，中国人都不可涉足，而只能参与一些诸如背米、拉车等苦力活，而且所有华侨还要随身携带“随身证”以备查，并需付四百泰铢，因而许多人根本无力支付，其往来书信也需经过稽查部门审查登记。华侨子女被强行逼迫学习泰文，如果私下使用中文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由此可见当时华侨艰难的生存境遇。陈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从1948年起任泰国《全民报》副刊编辑，并开始写小说。1952年12月，《全民报》被封，不久，他又担任新创刊的《半岛文艺》主编。他的作品，除长篇小说《三》外，另在此期间创作了短篇小说《空门怨》、《小巷之春》、《妈妈，我是怎样来的》等。

为了使读者更容易接受作品，巴金在文学语言上也平易近人。他的作品亲切、晓畅、炽热、抒情，从不装腔作势，佶屈聱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所倡导的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些精神，在巴金作品的语言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表现，形成了独具的风格，甚至影响了很多文学青年。有的评论家把它称为抒情性文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世界文学哺育了巴金，巴金走向了世界。巴金曾风趣地说，他有很多老师，“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我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除了法国的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夏目漱石、有岛武部，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7]除此之外，德国的斯托姆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作家的作品，巴金也广为涉猎。法国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俄国文学的真诚、厚重和深广的忧郁，日本文学独特的神韵、细腻和精致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学多姿多彩的风韵，都给巴金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以巨大之影响。正是这些外国作家作品，给了巴金以人类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

[7] 巴金.巴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248页